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酈道元与《水经注》

酈道元，字善长，北魏时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大约公元 466 年或 472 年诞生于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叫酈范，做过不少地方官，最后升至平东将军，并进爵为永宁侯。由于酈道元从小就跟着做官的父亲到处旅行，祖国各地的明山秀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酈道元成年以后，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经历仕途生涯。当时，正值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这位五岁就继承皇位的小皇帝，在宫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成年以后，对国家前途逐渐关心起来。他感到祖先连年南征北战，消耗财富，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只重视武略，而不注意文教，是无法使国家繁荣起来，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因此，当他掌权以后，锐意要进行改革，首要的方针要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汉化——向汉族学习，他甚至下令从平常的生活方式开始实行，譬如禁止穿着鲜卑服装，改穿汉服；禁止用鲜卑语通话，改用汉语；甚至将鲜卑的姓氏也改用汉姓，并从皇帝开始，他自己就改姓元，意为元首。其他则有长孙、穆、奚、陆、贺、刘等等；他鼓励鲜卑族青年男女与汉族通婚，从血统上与汉族结成更为亲密的关系。进而改革国家机器，向封建化发展，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封建秩序。与此同时，他决定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往洛阳，从此，以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中心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条件为保证，依靠自古以来的中原文化使得北魏更加兴旺繁荣起来。

酈道元青年时代做官的时候，尚未迁都，仍居住在平城。这里，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以来，已营造了 100 多年。城内有富丽豪华的宫殿楼阁和整齐热闹的市井街道。在城外，云冈村前、武州川岸雕刻了石窟寺，规模相当庞大，气势十分壮观，凝聚了千万工匠们的毕生心血，他们创造的石窟艺术，可算是首屈一指的精华。酈道元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自然也比较顺心适意。特别在公暇之时，游览之余，颇多感慨。他曾写道：“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巨大的佛像从岩石上雕凿出来栩栩如生，这是举世珍稀的艺术杰作）；山崖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佛殿傍山依水而建，林木掩映于水中，风光格外秀丽，成为新的景点）。”当时，他几乎踏遍平城郊外的武州川和桑乾水两岸，详细地考察了那里的火山、温泉和煤田，并作了纪录。

大同火山群，是第四纪后期喷发的，它属于分布广泛的内蒙古高原火山区的边缘部分，至今尚能清晰地见到 15 座火山锥地貌，孤立突兀于平原之上，全由玄武岩构成。但在 1400 年前，残余的活火山景象还能看到，诚如当时酈道元记载的那样：“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如微雷发响，以草爨（烧）之，则烟腾火发。”

在记述温泉时则云：“火井东五六尺，又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烧）之，则不燃，皆沾濡露结（水珠）。”如今到大同已看不到酈道元所记述的残余活火山和温泉的景点，所以他的记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记述大同煤田时云：“山有石炭（煤），火（烧）之，热同樵炭也。”这可能是首次提到大同煤田的文献。

以上各条记录，均可在《水经注·漯水注》中查阅到。

酈道元平常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有关地理方面的文献，诸如前代的《山

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三国时代佚名作者所著的《水经》等等。在阅读过程中，每有感触，或作眉批，或作笔记，他对《水经》一书尤感兴趣，但他认为写得过于简略，仅记干流 137 条，不符合我国地大物博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不少地方，与前代各种著作的记载颇有出入，譬如同一条河流，对其发源地或河道的变迁很不一致；对同一地区山川形势的描述，也有大相径庭的；还有沿河城邑兴衰的记载，或不明其来龙去脉，或相互矛盾，无所适从。总之，经常碰到不满意的论述。由此，他萌发了一种心愿，意欲亲自对华夏河流及其地理特点作一番细致的考查研究，然后整理出符合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文字来。他认为这一工作如能圆满完成，对今后如何开发利用国土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肯定会受到后世人的赞扬。应尽量利用出门办事或旅游的机会，有意识地去搜集第一手材料，为写书作充分的准备。

正当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孝文帝有意到外地巡视，郦道元本是皇帝身边的侍从，故得以随行。先从平城出发，太和十七年（494 年）八月到达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九月到达洛阳，十月到达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太和十八年（495 年）正月，又从邺城返回洛阳，二月，自蒲地（今山西蒲州渡口）渡过黄河，北返平城。太和十八年七月，又从平城出发，先到朔州（今山西朔县），八月，北行，直达阴山之麓，到达河套地区的五原城。

在这两次历时两年的岁月里，行程万里，郦道元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而且还学习司马迁写《史记》前的准备工作，所到之处，拜访许多耆老宿绅，参观了许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头脑里充实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材料，为他日后撰写《水经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漫长的旅途中，特别是在山西境内，几次反复路过，印象最为深刻。所以，境内的汾水、文水、晋水等查看得比较仔细。况且这一带既是平城的外围地区，也是洛阳的邻近，无论其经济情况、军事要冲或者交通条件都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郦道元当然更在心了。不但如此，对若干著名的景点，还特别着力描写。

比如他在蒲地横渡黄河时，特地专程溯流而上到龙门天险察访当地形势，他看了以后，对这段黄河天险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孟门（今山西河津县禹门口），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隄（天险）、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夏禹治水时所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山上的地层斜插入河水中），巨石临危（巨石突出于河岸），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水蒸气）云浮，继往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越看越可怕）。其中尚崩浪万寻（浪涛很高），悬流千丈，浑洪赑怒（浑浊的洪流像发怒的样子），鼓若山腾（浪涛奔腾像山倒下来），浚波颓叠（急浪一个紧接着一个），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水经注·河水注》）。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黄河禹门口的地理特点，流水侵蚀岩石可使石穿，岩层倾斜与河道深切的关系诸道理以外，将此处万马奔腾的波涛倾泻记述得惟妙惟肖，把它当做一篇散文来朗读，也会令人动情不已呢！

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相继即位，郦道元也离京城，到地方上任。先后担承过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东荆州（今河南泌阳县）刺史。当时朝政腐败，皇室成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竭尽骄奢淫逸之能事，皇帝自己不大亲理朝政，下属官吏也跟着腐败；而老百姓生活困难，

投诉无门，怨声载道。酈道元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秉性刚直的知识分子兼地方长官，比较了解民情，自然看不惯这种衰败的局面，与孝文帝在位时相比，颇有江河日下之危。作为个人的力量，他自己只能恪守节操，为政清勤。企图从法治开始，重整纲纪，对那些依仗权势犯罪的人，严格依法从事，绝不通融。史书上曾称颂他“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但痼疾根深，个人的力量毕竟难以力挽狂澜。于是，他把从政的目标转移到兴办教育方面来。他想，如果人的素质提高了，治理国家也就有希望了。在鲁阳设立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一地做好了，再向全国推广。

公务之余，酈道元仍醉心于搜集輿图方志，研究学问，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野外考察纪录，开始整理有关我国河川山脉的分布特点及其来龙去脉，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着“脉其支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读搜渠，辑而缀之”。决心写《水经注》。

在此期间，他还到过虎牢关（今河南汜水镇附近），观看雄伟险要的山川形势，缅怀前朝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大战吕布的悲壮情景，凭吊古战场的遗迹。他也到湑水（今沙河）之滨，细读秦碑汉碣，从中寻找有关当地往昔山川景物的记述，为撰写新著充实佐证。

同时，在撰写整理《水经注》过程中，更多的时间则花在已有书籍的考证博引上，他阅读过的古籍达 437 部之多，此外，还大量采用了汉魏以来的各类碑刻、民间谚谣、老人的记忆口述等。这些资料，往往未曾在书籍中见到过，而这些记录，却是酈道元悉心收集的对象，他认为其价值不仅可以印证古籍上的记载，而且还可以将大量失传的资料重新发掘出来流传后世。所以，他所撰写的《水经注》内容特别丰富，资料特别翔实，牵涉到的地域也特别宽广：北起阴山、南达汉水和淮水、西至华山、东到山东半岛。在这些地区，有亲自调查考察累积起来的笔记，也有前人文献中整理出来的论证。至于绝大部分的南方资料，则全部采用前人的记载，经过校勘以后整理而成。

这本花去酈道元毕生心血的专著《水经注》，共计 40 卷，约 30 万言，记述了大小河道计 1252 条。使原先仅记述 137 条河流，仅一万余字的《水经》扩大了 20 余倍。所以《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比较系统地采用了以水记山、因地记事的写作手法，探究了祖国大地上河道的源流及其变迁的情况，这里包括了水文学、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书中还历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经济生活、前朝古迹、奇闻逸事之类。所以，《水经注》确实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不可多得的世界名著。甚至有不少篇幅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而涉及到其他学科。例如，有关湖南湘乡石鱼山的鱼化石（埋藏于当地第三纪地层中）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鱼类化石材料中比较早的纪录，受到古生物学家们的重视。

酈道元的研究工作与写作态度都极为严谨、认真，他经常根据确凿的材料，订正了前人的记述错误，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例如，提到有关陕北黄河段（今黄河故道）时写道：所谓“悬水百余仞，水涌起方数十丈”的情景，并不是秦始皇铸铜人沉没于此所致，而实际情况诚如《史记》中所说的，在魏文侯二十六年（公元前 443 年）此间发生强烈地震，虢山崩坍，堵塞河道所致。这一科学论断，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讹传。酈道元在写《水经注》时，并不是单纯做河流的描述工作，而更重视水利工程，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例如，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战国时期的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希望国家今后对水利工程给予重视，因为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他的见解，和我

们经常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语多么相似。由此出发，酈道元还进一步阐述农产品加工、煮盐业、酿酒业以及冶炼业等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都作了一定篇幅的论述。

至于《水经注》中对山河胜迹的描述，简直是一部绝妙的旅游文学的著作。例如，众所周知的三峡风光的那段文字，早已脍炙人口。就连描写北方农村质朴淳厚的生活画卷，也如一篇明快的散文诗，令人如醉如痴。例如在阳城淀（即今河北安新县的白洋淀）（《水经注·滹水注》）一节云：

“博水……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潏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筍是丰（非但蒲筍之类的水草十分丰盛），实亦偏饶菱藕（同时也遍布菱藕）。至于婁婉卼童（天真活泼的孩童），弱年崽子（少儿幼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有的单独划着小船去采菱，有的则几只船联合起来去摘荷莲）。长歌阳春（春日放歌），爱深绿水（深深地爱上碧水），掇拾者不言疲（采摘者不感到疲劳），谣咏者自流响（歌唱者颇为自得）。”

在酈道元笔下，当年白洋淀的农家乐跃然纸上，诚如一首美妙的田园交响诗。

据目前资料考证，酈道元真正坐下来潜心著述《水经注》，大约在宣武帝四年（515年），即从东荆州刺史卸任以后，回到家中，花了几年的执笔时间就完成了，时年约在50左右。当然，这本书的腹稿早已酝酿了。

酈道元一生中，还写过《本志》13篇及《七聘》等书，可惜没流传下来，也不清楚其中的内容了。

当他完成《水经注》以后，还曾出任河南尹，这是当时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相当于今日的首都市长）以及御史中尉，负责监察朝廷及地方上高级官员的廉政问题。

当时正值胡太后专权，皇帝的兄弟与亲族们滥用职权，为非作歹，国家与老百姓都遭到莫大的祸害。而酈道元的刚正不阿的性格驱使他不畏强暴，敢于挺身而出与皇帝据理对抗。皇族们对酈道元“敢于犯上”的行为深恶痛绝，把他视为眼中钉。当时，适逢雍州（今西安市）刺史肖宝夤叛变，皇帝就借机指派酈道元前去镇压。当他来到阴盘驿（今陕西潼关县东）时，叛兵将酈道元围困起来，断粮断水；而朝廷又故意不派兵前往救援，在此困境中，酈道元被叛军俘虏，壮烈牺牲。

酈道元死后不久，国内政局大乱，北魏的统治也摇摇欲坠，于公元534年终于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并存的政权。

酈道元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道德和文章名垂青史，为后人所敬仰。特别是他的《水经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地理学名著，也是一部难得的旅游文学巨作，留传千古！

郑和下西洋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上了皇位。为了扩大与海外的交往和显示明朝的国威，明成祖决定派舰队出海。他选中了郑和担任舰队的领导人。

郑和，原姓马，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回族，世代信仰伊斯兰教。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姊姊，还有三个妹妹，排行第三，所以小名叫三保。他的祖辈可能是西域人，在元代蒙古人征服云南后，移居到云南。父亲名叫马哈只，曾到过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所以叫“哈只”（这是赠荣誉给到过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徒的专称）。从云南到麦加，相距万里，马哈只是徒步前往的，历经千辛万苦，自不待言。父亲回到云南后，经常像讲故事一样地谈论起旅途中的见闻，如何辛苦，如何遇险，又如何高兴等等，当然也宣扬自己如何本着坚韧不拔、追求真主的精神而到达麦加。年轻的郑和，听后无比兴奋。在见多识广的父亲熏陶下，对异域殊方的情调，好怪猎奇的思想早已有准备。他曾暗暗思量，如果有一天自己有机会跳出这狭窄的家庭，到广阔的天地间去遨游，该是多么幸福！所以，从少年时代开始，郑和就很注意锻炼身体，培养毅力，潜心阅读史籍以及航海知识等。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将傅友德平定云南时，郑和还是个11岁的幼童，但身材长得魁梧，浓眉大眼，行如虎步，声如洪钟，而且聪明伶俐，能言善辩，颇讨人欢喜。也许是偶然的时机，他竟被傅友德看中了，就把郑和带到南京，后来转送给燕王，来到北平，在燕王府内当一名侍童。朱棣看他才貌双全，十分喜爱他，并亲自给他改名换姓，叫郑和。郑和长大以后，就被阉割，当了一名小太监。然后又让他到军队中服役。

当时，朱棣正率领百万雄师下江南，郑和在几次激烈的战斗中显示出非凡的机智骁勇。遇到上级布置工作，做事很有魄力，应付自如，八面玲珑。待人诚恳，谦虚谨慎。朱棣就逐渐提拔他当了指挥官，在战争中，运筹帷幄，常能取胜，更深得朱棣的器重。所以，朱棣想选派一名出海的领导人，首先就想到了郑和。

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首次率领船队远航，即所谓“七下西洋”开始。当时所说的西洋，并不是欧洲的海洋，是指以南洋群岛的婆罗洲为分界线，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等海域统称为西洋。此次远航，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航海史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发展，是地理科学上的一大成就。

这支船队相当庞大，共有27000人，除士兵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和医生。乘坐的船有62艘。其中最大的船有九道桅，长44丈，阔18丈，风再大，浪再狂，也能平稳地行驶，这就是指挥船，称为“宝船”。其次是八道桅船，长37丈，阔15丈，主要用于装运马匹，称为“马船”。再小的是七道桅，做一般乘坐用。最小的，只有五道桅，比较灵活轻巧，属于战船。整个船队，排列起来行驶，长达10里，浩浩荡荡，十分威风。

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自从公元前三世纪我国发明指南针以来，到了明代，各项技术指标已经相当完整，因而开辟了航海史的新纪元。

当时船上使用的铁锚也特别大，用桶口粗的棕缆吊在船头上，有七丈三尺长的杆，三丈五尺长的爪，八尺五寸高的环。这种锚没有几百人的齐心协

力是拉不动的，所以抛锚以后，能顶得住海上的狂风骇浪。

郑和率领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沿大陆海岸南行，第一站到达占城（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刺加、古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

郑和的船队负有友好往来的任务，带去大量礼品，沿途拜访各国、各地的头目。每到一地，一方面表示亲善友好，一方面宣扬国威，并作了适当的物资交流，也就是进行外交和对外贸易的活动。比如船队到达第一站占城时，当地国王听说大明天子的特使到来时，十分高兴。骑着大象、身穿五彩礼服，头戴锦花金冠，带领群臣前往码头迎接郑和一行。当郑和递上国书时，更是受宠若惊，以国宾之礼相待，并向郑和献上珍贵的礼品。其中有一件形如美玉的珍宝，在月光下特别耀眼，称为“宝母”；又有一件火珠，白天放置阳光下，到晚上，放出的光芒能燎香烧纸；还有一件水珠，当投入混浊的水中，可使浊水立刻澄清。此外还有辟寒犀，冬天时放置室内，可使气温升高；象牙簪，用象牙抽成细条，然后编织成席子等等。当然，郑和也向他回赠瓷器、金银饰品、绸缎等中国特产。

到其他地方，郑和也同样受到隆重欢迎，除互赠礼品外，还进行贸易，以中国的土特产换回药材、香料、宝石、染料以及虎、狮等珍稀动物。

这次出使首航，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随后，西洋各国也都派特使前来中国，向明成祖朝拜、回访。大明天子受到域外的尊敬，自然高兴极了。除了夸奖郑和以外，也表扬了整个船队。同时，继续准备第二次下西洋。

每次远航，郑和及其随员们对沿途各国的地理形势、交通条件、气候特点、物产种类、民情风俗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记载，为大明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总结了前四次的经验，决心向更远的地方前进。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船队照例沿着以往熟悉的航道南下。首站到达满刺加（今马六甲州），稍事休息以后，将船队分为几个小队活动，有些驶出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霍尔木兹海峡北岸伊朗的阿巴斯港）及阿丹（今也门的亚丁）一线活动。另一些船队则从锡兰横渡印度洋，在海上遇到凶猛的风暴和滔天的骇浪，即使现在的海船也视为畏途。虽然唐代时，这条海上交通路线已经开辟，但都是沿着大陆边岸走的，而此次郑和率领的船队，却采取越洋直航的方案，尚属首次。船队在大洋中与风浪搏斗了20个昼夜，未见一寸土地，几乎没有航标。当时，完全凭借制作精良的指南针，观察风云变幻、星斗位移等丰富的海上经验与高超的航海技术，终于战胜重重困难，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眼前荒山秃岭、寸草不生，天气炎热而且干燥。居住在那里的土人，身躯矮小，皮肤黝黑。他（她）们的上身不穿衣衫，妇女们双乳裸露，好像一点儿也没有羞涩的表现。此情此景，使来自中国的官兵们诧异不已，不知来到何等世界。经过反复查询，方知船队到达非洲的东海之滨。上岸后，首次到达刺撒（今索马里北部的泽拉）访问，然后沿岸南下，再到木骨都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卜刺哇（索马里东部的布腊瓦），一直到达赤道以南的竹步（索马里东海岸的准博）、麻林（肯尼亚沿海），然后再穿过莫三鼻给海峡，绕过马达加斯加南端返航。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组织大规模船队访问东非的壮举，也是首次直接考察东非地理形势、民情风俗、物产资源的纪录。

沿着非洲东海岸各国，郑和向各位国王或酋长们赠送了中国的特产——

青瓷器、丝绸、茶叶之类，他们也回赠当地的珍贵物产。其中有个奇异动物，高近两丈，长颈细腿，毛皮黄褐带有白色的斑块，奔跑飞速，却从来不发出任何嘶叫的声音。中国人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动物，研究再三，认为这就是古书上所记载的“麒麟”，现在知道，这就是长颈鹿。

这次远航抵达东非的船队，直到明永乐十七年（1419）返抵南京，随船队回来的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使节，是我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收获。不仅如此，在地理发现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郑和率领的船队的非洲之行，比欧洲人发现非洲好望角早 67 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 73 年；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时间早 103 年；比达伽马巡航非洲好望角到达南印度早 80 年。而且郑和船队的船体都比欧洲的大，船员的人数更多，船只的数量也更多，至少有 40 艘，船体抵挡海上风暴的能力，辨别航行方向等科技指标，都比欧洲的强得多。由此可见，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组织能力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船队所到之处，本着友谊第一的精神，绝对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在物资交换等经济活动方面，也完全遵照自愿与平等原则，绝不像当时欧洲人那种以强凌弱的凶暴手段，甚至犯下杀人放火的罪行，因而赢得了西洋各国对大明中国的无比信任与尊敬。

几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不仅开拓了外交和贸易的成就，提高了国家的威信，同时也了解到域外的地理、物产、人情，明成祖充分肯定了郑和的伟绩。

1433 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也就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在这次航程中，郑和前往麦加，以偿宿愿，果然，船队平安地穿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再向西北驶去，终于到达日夜向往的天方（即今之麦加）。实现了一生的宿愿。也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郑和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说明我国航海技术空前繁荣，指南针的应用，导航的准确性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造船工业的技艺也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航行记录，保存在《武备志》中，航程上的各地地理位置，甚至包括海洋里的暗礁与险滩都作了纪录与标记，为舆图的制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例如《郑和航海图》上，都详细地纪录了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停泊的位置等。与郑和一起出海的马欢、费信、巩珍等还分别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记载了海上航行的风向、气候、潮汐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及其规律。书中也记述了各地山川形势、物产、人文等材料，涉及到海洋学、气象学、天文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外交成就、文化交流、物产交换等影响更为深远。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地理学方面留下宝贵的财富。

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末江苏江阴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生于南直隶江阴城南两公里横渡河中流的马镇乡南阳歧村，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享年55岁。

徐霞客在幼小的儿童时代，就显示出聪明颖悟的天资，又由于优越的家庭读书环境，所以他很容易从书本上获得大量知识。每遇著名的诗文，他总是强记背诵，速度还很快呢！但他最喜欢阅读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科举文章，而是各种当时视为不正规的闲书、奇书，特别对描写和探讨大自然方面的书最感兴趣。诸如古今史籍、輿国方志，山海国经等都是他的涉猎范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尽发先世藏书，并鬻未见书，缣组充栋，叩如探囊。”由于他的“肆志玄览，目空万卷”，徐霞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对天下名山大川的地理形势在青少年开始时就已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同时，在阅读中，发现各类书籍之间有疏漏或错误的地方，于是萌发了游历山水的愿望。决心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天地间的各种奥秘，问奇于名山大川，并把游踪所至，如实纪录，欲开一代游记之先河。

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对于功名利禄也看得十分淡薄，平生也不大欢喜与官宦人士结交，宁愿长期居住在乡间，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阅读诗书以自娱。这对徐霞客的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

徐霞客22岁那年，就辞别父母踏上远游的征途。

他的游踪相当广阔，北抵晋冀而览恒岳（今五台山）；东达浙闽，渡海而登普陀；西南远蹇滇西边陲；南及百粤（广东）而游罗浮。驰骛数万里，踟躅三十余年。履痕所至，相当于今日之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湖北、广西、贵州、云南16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市，遍及大半个中国。

所游的名山，包括泰山、普陀、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嵩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恒山、衡山、九嶷等；所游的胜水，包括太湖、长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凡游踪所经的古洞、名刹、温泉、飞瀑、奇峰、深林、幽篁等灵境奇观，无不舍身而趋，饱览而归。他以惊人的毅力，非凡的胆识，“闻奇必探，见险必截”。

在他的旅途考察期间，不避风霜雨雪，不畏虎狼当道。他自己记叙了旅途中的情况说：“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所以，他在攀登山崖时，不需有现成的途径；过河渡水时，不必找现成的渡口码头；遇到深洞低矮时，就卷曲起身躯模仿蛇身匍匐前进；遇到危峦绝壑时，学着猿猴的样子，以臂代步拉着古藤或绳索攀登。有时候，不巧跌落到山谷流水中，遍体鳞伤也不后悔，仍然勇气十足，奋发蹈厉，爬起来继续旅行。就这样，历时34年间，几乎日日如此。在行旅中，还有5次碰到强盗，所带财物与行李被洗劫一空；4次断粮，饿着肚子，也都没有动摇他的考察决心，尽力完成预期的任务。

有一次，他在湖南境内，沿湘江旅行时，遇到一伙强盗，不仅抢走了他的钱物，还被凶狠地揍了一顿。与他同行的一名叫静闻的和尚，由于强盗的凶残受伤而不幸去世。徐霞客在痛失良伴之际，曾作挽诗说：“西望有山共生死，东瞻无侣去来难。”表达了他仍要继续西行探胜的决心。当时，路上

有朋友劝他暂时回家休息一阵子，不必再冒这种无为的艰险。可是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怕，即使不幸在旅途上牺牲了，就拿一把锄头，就地挖个坑，给我埋葬在那里就满足了。”仍然按照既定的方针前进。

当他进入西南山区以后，曾几次遇到餐风露宿、饥寒交迫或无食盐的困境。他说：“这一点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个草堆让我躺下来休息，就心满意足了。”有时，行走在无人的山区里迷了路，同行者不知所措，而徐霞客始终乐观地开导他们说：“迷路有什么可怕？也不必懊悔，也许就在迷途上有新的发现。对于探幽凌险、披奇扶奥的旅行者来说，三误三返也不必灰心丧气。”有时，碰巧真的在迷途中获得新发现或意外的收获，他就高兴得不得了，甚至大喊起来：“值得！值得！”

虽然徐霞客白天多在山野间长途跋涉，身体已经极度疲劳，但到晚上住宿的时候，总是把当天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写在日记本上。即使有时找不到住处，露宿荒郊、寄身于草莽之间，也要燃起篝火或松明，在风吹摇曳的火光里，蜷伏在包袱上写他的日记。就以如此坚韧不拔的毅力，写下了独具一格的“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的《徐霞客游记》。在这部巨著中，从 22 岁开始，一直写到 55 岁因病返回家乡，历时 34 年的旅行纪录。

这部著作的最初稿本共计 240 多万字，是徐霞客毕生心血的结晶，是他的意志与才华所融合而凝成的科学与文学的硕果。史夏隆评论说，这是徐霞客“一生心血，走笔成书”的杰作。但因 300 多年来辗转抄录，散失残缺，迄今仅存 20 卷，约计 60 万字，还能见到其宏博的内容。

虽然书名为游记，但它不同于一般作家所写的游记，而是集地质、地理、水文、气候、植物以及社会人文诸多方面的科学内容与风土人情的巨著。其中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尤为珍贵，钱谦益曾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西方的地理学界对这部巨著曾赋予高度的评价，并在 19 世纪时即翻译过去，作为他们研究自然现象的重要参考文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对本书曾作这样的评说：“他的游记并不像 17 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 20 世纪的野外勘探家所写的考察纪录。”

《徐霞客游记》的最大成就是在地理学方面。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广泛而系统地描述岩溶地貌的科学纪录，比以往地理学界公认的最早研究岩溶（喀斯特）地貌的德国地理学家瑙曼于 1858 年记述岩溶地貌还要早 200 年。

徐霞客从湖南经广西到云南的旅途中，一路上正好都是石灰岩地貌发育区。他正确地描写了桂林漓江的奇峰群“青莲出水”；阳朔周围则是“碧莲玉笋世界”、“山复嶢嶢，骨立石皆廉利侔刀戟”。并给这些岩溶地貌专门命名了“石峰”、“石桥”、“环洼”之类。他前后探索溶洞共达百余个，且考察精细，一丝不苟。比如在桂林调查七星岩溶洞群时，手擎火把，目测步量，将全山 15 个溶洞的分布规律、结构、特征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记录。他认为石灰岩的质地比较坚硬，不易作机械风化破碎，但易被水流溶解。所以，凡石灰岩分布区，平地多拔起的奇峰，山内则多空洞，洞内又因地下水的长期活动，溶解与侵蚀并进，使溶洞日益扩大。洞中渗透的水中，溶解了高浓度的碳酸钙，当其附着于洞顶和洞壁上，就会凝结起来，形成钟乳石，当其滴下，在洞底或洞壁上凝固聚积，则形成石笋。这些见解与记录，无疑是世界上最有系统又最早的岩溶地貌学的宝贵文献。

其次，徐霞客对水文学的研究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自《禹贡》以来，都认为“岷山导江”，即长江的发源地就是岷江的发源地。但徐霞客经过野外的调查研究以后，提出大胆的质疑：黄河的发源地在昆仑山以北的星宿海，但河水的流量不大，其宽度也不及长江的三分之一。反之，长江的流量远比黄河巨大，为什么发源地反而比黄河短呢？为了解开这个自己提出来的谜，于是他“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经过数千里的跋涉，终于查清楚并确认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然后写成《江源考》，这是我国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但可惜的是，至今所见到的这本书已非完整的全文，而是残缺本了。

又比如，在南方诸水系中的南盘江（云南省的第四条大河），关于它的发源、流向，历来记载都很模糊，经过徐霞客的实地考察以后，写出《盘江考》，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将其支流写成上游的错误，并分别确定了交水和可渡河各是南盘江和北盘江的发源地。近代我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在其《徐霞客年谱》一书中，特意称赞《盘江考》是全游记中最重要的篇章。

与此类似，徐霞客在福建旅行时，将九龙江与建溪作了比较，指出两溪的发源地高程颇为相仿，但两溪内的急流、险滩的分布却不相同，提出了“程愈迫则流愈急”的地貌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用现代地貌学的概念来说，距离侵蚀基准面（海洋）愈近、流程愈短的，则多险滩了。

此外，他还提出了河流的侵蚀作用使“山削成壁”的概念，这是流水侵蚀地貌的重要见解和特点。

第三，徐霞客对火山地质的观察和研究，也颇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游记的《硫塘吼虎》（1639年5月）一节中描述了滇西腾冲活火山喷发后（离徐霞客看到时仅过去30年）留下的温泉及其周围的情景，因火山喷发导致附近山林烧毁的生动场面，并指出硫磺等岩石与矿物都是火山的赐予，这是很正确的论断。

第四，徐霞客对旅途中所见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自然物体与现象，诸如岩石、矿物、植被、气候等各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并着力加以描述。甚至在武当山等地，不辞辛劳与艰险采集了榔梅；在嵩山采集了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花茶等珍稀名贵的标本，作进一步研究。

徐霞客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当时的几位著名文人都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如陈函辉说：“霞客工诗、工古文词，更长于游记。文湛持，黄石斋两师津津赞美。”钱谦益称他的游记为“古今游记之最”，奚又溥更以为“固应与子长之《史记》并垂不朽”。美誉之辞，无以复加。

徐霞客一生的绝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荒山野岭间度过的，直到1641年，56岁时，因病魔缠身，不得不中止旅行，只好返回故里。此时，他将自己几十年来收集的岩石、矿物、植物标本一一摆放在病房内，朝夕摩挲相对，在抚摸中回忆毕生的考察事业，内心发出微笑，好像在说，我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期望，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与世长辞而去。

1979年，在他的家乡江阴市街头，落成徐霞客雕像，在其祖居处建成徐霞客纪念馆，并在东西两壁上镶嵌着77块明代的晴山堂石刻，记载了徐霞客的家世及其一生的旅游活动的事迹，成为目前研究徐霞客的重要资料，吸引海内外学者来此拜谒。

马可·波罗及其游记

元朝时，经过两次西征，疆域辽阔，东西方贸易往来畅通无阻，十分频繁。许多西方商人往来其间，有的还受到元王朝的礼遇，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位。

马可·波罗的父、叔都是商人，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叔到达上都，得到了忽必烈接见。此后，马可·波罗就留在朝廷做事。

马可·波罗聪明好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学会了汉语和蒙古语，还熟悉了大汗宫廷里的礼仪与行政机构的各项法规。同时，他又似饥如渴地学习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开拓了他的广博学识，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年轻的马可·波罗，除了在朝廷和大都（北京）做应差外，还经常到外地视察或出使外国。有一次，皇帝叫他到云南办事，从大都出发，穿过山西、陕西、四川，深入到川藏边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到达云南。当执行任务完成后，还进入缅甸北部。足迹所到之处，一一考察了当地的民情风俗、物产资源之类。回来以后，向皇帝作了详尽的汇报。忽必烈听后，非常满意。从此，对马可·波罗的才能更加赏识，除当面夸耀嘉奖外，准备日后更委以重任。

果然，后来元世祖就派他到扬州担任总督，那里自唐、宋以来就是重要的商埠，到元代时，仍然是东南重镇，管辖24个县。马可·波罗在这里呆了三年。在此期间，由于他的秉公执法，深得百姓们的爱戴。这在中国历史上，让一个外国的年轻人担承地方长官，是没有听说过的。后来，皇帝还派他出使南洋，到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还可能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像这样，一个外国人，代表中国政府当外交官，在历史上也没听说过。

从1275年开始，一直到1292年初，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元朝政府任职，一晃17年过去了。但他们毕竟是客居异域，思乡心切，他们也曾几次向皇帝提出要回意大利的愿望，但皇帝恩宠他们，再三挽留，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以长途跋涉，始终没被皇帝批准。

1292年夏天，波斯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去世了，特地派使者到大都求亲，元世祖为了安定边疆，与邻国友好，也就答应了，并选择了一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准备远嫁，赐给伊尔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尔汗国的使者得知后，当然很高兴，并且希望早日启程，但他考虑到公主年轻，长期在皇家娇生惯养，经不起陆路的长时间劳顿，建议取道水路去波斯。这一计划，得到元世祖的认可。那么由谁来护送公主？使者事先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接触交谈过，知道他们对水路情况有过经历，比较熟悉，于是请求皇帝派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护送归波斯，皇帝也就同意了。

大约在1290年，马可·波罗父子与马飞阿、波斯使者一起，浩浩荡荡600余人，分乘14艘四桅的大海船于福建泉州启航，沿着万里南疆海域扬帆前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霍尔木兹海峡，登陆到达波斯。花去两年又两个月时间。不巧，当时伊尔汗国国王已去世，于是将公主交给其子合赞汗。

当他们三人完成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任务以后，便告别波斯伊尔汗国王，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索，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再乘船渡过地中海，于1295年冬天回到阔别26年的故乡威尼斯。

13世纪时，威尼斯与热那亚是意大利两个著名的城邦，手工业与商业都

相当发达，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经济冲突，往往发生战争。1298年，热那亚又进攻威尼斯。马可·波罗出于“爱国”思想，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船，自任舰长，参与战争。9月7日，不幸战败，全军覆没，马可·波罗也被俘，关进了监狱。

在当时，意大利人都知道马可·波罗长期旅居中国，经历很不平凡，广闻博见，才能出众，是深受群众爱戴的知名人士。热那亚当局并不想处死他，倒反想劝说他投降，将来可为热那亚出力。所以暂时让他和一批有“知名度”的战俘关在一起。在难友们中间，相互交谈还比较自由。从马可·波罗的口中得悉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他们对他格外敬重。正好有一位来自比萨的作家鲁恩梯谦，与他同牢，这位作家通晓法文，对马可·波罗的讲述也深感兴趣，于是用法文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出狱了，鲁恩梯谦就把狱中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名为《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一举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奇书。

到1299年7-8月间，马可·波罗终于获释。此时，他也不想再干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工作，还是重操旧业，经营商业，并与一位名叫多纳塔的女子结了婚，过着平民生活，后来，有了三个女儿。

到1324年，马可·波罗已经70岁了，年老多病，身体日益虚弱，终于卧床不起。当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已经在世间广泛流传，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怀疑东方竟有如此繁华，不敢相信，他们以为古罗马的故乡才是举世无双的，甚至有人为此特意跑到马可·波罗的病床前询问：“书中所记载的事，是否属实？”他回答说：“不仅真实，而且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经历中所见所闻的一半呢！”这句话，就成为马可·波罗对《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读者的最后遗言。

《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影响巨大，在欧洲早期绘制的《世界地图》就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设计出来的。许多欧洲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也都由于阅读了这本书而得到启发和鼓舞，羡慕东方文明，激起了冒险东航的决心。甚至哥伦布（1492年）当初上书给西班牙国王时，要求到中国 and 印度去，也是受到本书的影响。后来，由于航向的错误，来到中美洲时，还以为到达印度，上了大陆，大肆宣传“发现”新大陆。

这本书对我国来说，也是影响至深。特别是研究元代的历史及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也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当然也是研究当时亚洲各国的重要文献。

在这本书中，记载了马可·波罗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出发，沿途经过亚美尼亚、土库曼、格鲁吉亚、两河流域、波斯（伊朗），直至新疆境内以及我国内地的所见所闻。也包括了他出使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以及相邻的缅甸、日本、俄罗斯等地的地理、政事、宫廷、节日、游猎、风俗、人情、交通、商业各种情况，所以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马可·波罗游记》发表以后，特别对旅行家或探险家来说最富有吸引力，例如，哥伦布在出发远航之前就曾看过本书，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屡次提到。至今，哥伦布当年看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仍保存在里斯本，在边栏上，哥伦布做了好些摘要。哥伦布到达美洲时，还以为到达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叙述的印度，并且把墨西哥当作书中的“行在”。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在亚洲历史的研究上，无疑是重要的文献。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向他们展示了一片新的

土地和国家！

究竟是谁发现了新大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们都习惯于这样的说法。500年前，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并从国库中得到巨额金钱，于1492年8月3日拂晓率领87名水手，分乘不大的3艘帆船，从西班牙南端的帕洛斯港起锚西航，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经历了70天的艰苦航程，于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然后又继续航行，到达古巴、海地等处。他在海地建立了据点，留下一部分人驻守，自己又率领船队前进，于1493年3月16日返回帕洛斯港。这就是被欧洲历史学家称之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壮举。从此以后，他曾先后4次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往返于美洲。

西班牙为了炫耀自己昔日帝国的威武，总是把发现新大陆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的质疑，从各方面纷纷提出。

意大利作家、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保罗·埃米里奥约在其《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两个争论》一书中，巧妙地回避了‘发现’两个字，他写道：“是发现？还是相遇？不，我们庆祝的是世界的扩大。由于一位天才的海员，我们的世界从1492年10月12日变得更辽阔了。”但仔细琢磨，保罗·埃米里奥约的这几句话，仍然念念不忘‘发现’的味道，这也许是欧洲人的心态表现。

《今日美国报》在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之际，发表的文章则是另一番口吻：“今天甚至最热情支持哥伦布的人也学会了用词的谨慎。他们不说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而是哥伦布意外地遇到新世界（欧洲人称美洲为新世界）。华盛顿的许多中学老师也说，他们上课时提到哥伦布的名字时，总是想回避‘发现’两个字，改而使用‘考察’或者‘以欧洲人的名义承认新大陆’之语”。

今天，拉美国家，绝不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样的语言，他们的大多数人，尤其在印第安人看来，这无异于一句过嫌的话，甚至会触犯众怒而遭到咒骂。

为此，在拉美国家组织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分别在1984年和1988年通过了墨西哥代表的是“相遇”，而不是“发现”的提案。认为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是两个大陆的“相遇”。那个时候，美洲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而且在此后的两个大陆的文化交流融合中，美洲的大陆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派生出新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双方都是主角，分不出主次。因而用“相遇”一词，更能符合历史的真实，更能体现两大陆及其人民的平等地位。

198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个文件上也说：“两个大陆的相遇，是两个大陆人民间的相互发现。这不仅是欧美两大大陆的相遇，两种文化相遇，而是东西两半球的相遇。”

由“发现”改为“相遇”（也包括“考察”、“到来”之类的用词），这不是词语上的更正，重要的，最先发现新大陆者不是哥伦布。因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已有3000多万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已创造了光辉的印第安文化。

于是，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印第安人是土著居民吗？还是外来的居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新大陆的发现者。据古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意见，美洲大陆至今尚未找到猿人化石的遗迹，因此，美洲早期

人类应该是外来的。16世纪时，西班牙人何塞·阿科斯塔提出美洲的印第安人可能是亚洲人的后裔。18世纪，俄国学者克拉契尼科夫第一次提出古代人类经过西伯利亚迁至美洲并形成印第安人的假说。

为了证实克拉契尼科夫的假说，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提出大量证据，基本上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亚洲人到美洲去的路线，最佳的方案是经过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或白令陆桥到达阿拉斯加，然后再扩散到美洲各地。

这条路线可能吗？首先看看当地的地理条件，目前，白令海峡的最窄处的距离为85公里，最深处为59米，每年的10月到翌年的7月是冰封季节，从冰上行走完全有可能。另外，据第四纪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在地质历史的近几十万年来，地球上曾多次出现冰期，以最后一次玉木冰期为例，全球海平面曾下降105—130米，白令海峡的海底曾4次暴露于地面，这个“海底地面”最宽时可达1000公里。其中最近的一次冰期发生在35000年前，当地没有海峡，而是一块陆地，其南北宽度可达1600公里之多。到25000—12000年前，这块前期的陆地才沉降到海平面以下。35000年前，正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当时，亚洲人分布的地域相当广阔，他们完全有可能利用冰期时出现的陆地来往于亚洲和美洲之间。

既是这样，那么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旅途上能有什么证据呢？有！据1972—1974年期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在河北省阳原县广大群众的帮助下，于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找到近200多件的“楔状石核”。这是一种上端宽，下端窄；前端宽，后端窄的形如楔状的石核。它是古代人用于剥取石片的石块。过去曾在蒙古、西伯利亚、我国的东北、内蒙、新疆以及北美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校园内找到过，尤其是后者，牵涉到北美人种的来源及北美文化的来源问题。根据上述“楔状石核”产地的分析，北美人种及其文化渊源肯定与亚洲有关，即来自亚洲。经过旧石器考古学家对上述各产地遗址进行碳¹⁴的测定以后，大致确定出这些地点的先后次序是：华北、东北、戈壁沙漠（蒙古及内蒙）、西伯利亚、北美。于此可见，印第安人来源于亚洲，还很可能就是中国人种呢！

1988年，《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中也提出类似的例证：印第安人玛雅太阳历中，可以清楚地见到中国人八卦历的文化基因信息。推测印第安人的祖先是美洲中华民族的先民。

最近，一个由巴西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亚马逊地区20个印第安人部落作了脱氧核糖核酸分析，其结果也表明印第安人确属东亚、北亚古代居民的后裔。

此外，1973年和1975年美国考察船在加利福尼亚海域打捞出许多人工制作“石器”，推测这是古代沉船的石锚和压在船舱底层用的石头。由此，研究者提出这些“石器”遗物是我国殷代人航行到美洲的见证。

1991年美国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第10期上刊登了美国地理学家约瑟夫·布鲁查克的论文，介绍美国纽约州奥次顿哥村易洛魁人（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称奥次顿哥）发现两张彩色的鹿皮画，一张是《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另一张是《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于是推测易洛魁人是五六千年以前中国人来到北美大陆的遗民，也就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

亚洲人跨越白令海峡以后，先到阿拉斯加，再沿落基山脉南下，然后散布到整个南北美洲。并在那里创立了印第安文化，他们在农业、畜牧、天文、

数学、建筑、纺织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秘鲁和玻利维亚高原及滨海地区留下他们古代文明遗址是世界古代农业文明的摇篮之一。印第安人的祖先，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

至此，似乎中国人最先来到北美的证据越来越多，但终究这些看法都带有推测性质，一时还难以完全肯定，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发现能够解决谁先来到美洲之谜。

与上述情况类似，欧洲的历史学家也提出最先到达美洲的即使是欧洲人，但决不是哥伦布。例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记载：约在公元 1000 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时间提早将近 500 年）维金人艾里克逊为开拓殖民地，从冰岛横渡大西洋到达格陵兰，然后再到北美洲盛产葡萄的“温兰”。这里所说的维金人，就是 10 世纪时的北欧人，主要是挪威人，当时他们已经掌握航海技术，曾于公元 870—930 年间开发冰岛。其间，一个叫冈布琼的航海家首次发现冰岛以西还有一个大岛。982 年，艾里克逊步冈布琼的后尘，就来到这个大岛，即格陵兰。此后不久，冈布琼还组织了 400 人的队伍，在格陵兰建立居民点，到 1000 年，艾里克逊带着他的儿子跨上北美大陆，并在那里经营了 10—20 年之久，由于内部发生矛盾，酿成流血战斗而告终。这段历史事实，早已被欧洲历史学家所公认。而这里所说的“温兰”，现经考证，就是北美东海岸的诺卢斯科西亚。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遗忘了在哥伦布之前就有人到达美洲了。

本世纪 60 年代，挪威考古学家英格斯塔德在加拿大纽芬兰岛北部的梅多斯发掘到人工制品、熔铁炉渣以及建造房屋的地基等遗址，然后用碳¹⁴进行年代测定，其时间正好是 1000 年，应该属于艾里克逊当年所建立的据点。

近年，瑞典考古学家还发现一条属于公元 8—10 世纪的由维金人驾驶的沉船，船身长达 13 米，其中有 21 具遗骸及其他大量器物，这表明北欧人曾来往于北美之间的航行遗迹，由此也可旁证欧洲人比哥伦布还早就已经到达美洲了。

除了中国人、挪威人比哥伦布早到美洲的诸多实证与故事以外，目前还有几种其他人到美洲的说法：一种认为日本人可能在 5000 年前曾来到南美，其证据是 1956 年时，有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在厄瓜多尔海滨发现一批陶片，其形态特征与日本 5000 年前的古陶片十分相似，特别与九州的最像。于是，认为日本的九州渔民曾在 5000 年前漂洋过海来到南美，但许多学者感到这点证据不足令人信服。

第二种是传说故事，6 世纪时，爱尔兰的僧侣为了找寻“天国”，曾乘坐小船在大西洋上航行，到过冰岛，还可能到过佛罗里达半岛或加勒比海群岛。因为在故事中提到他们所到的“天国”里，气候温和，树木葱茏、鲜花盛开，应属于亚热带的环境。还有与此类似的故事，比如 1583 年在英国出版的一本书上提到 12 世纪时，威尔士王子玛拉克不愿参与家族间的王位争夺，带了 10 只船移民来到美洲，并在那里繁衍子孙。可是，这也只是故事而已，不能当作历史的实证。

至于哥伦布当时为什么要去远航？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做了黄金梦。他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黄金是一个可以令人惊叹的东西，谁能占有了它，谁就能支配他所欲求的一切。有了黄金，即使要把灵魂升到天堂也是可以做到的。”为此，他当时很想探索去印度和中国的新路。当时，欧洲人认为这两个东方古国藏有丰富的黄金，可以到那里去获取大量黄金。所以，